

疆地區的生態與族群問題、能源史、工業史等方面的議題，注重檔案資料的使用和闡釋，以及全球意識的潮流激發的環境史新探索。本書主要運用新疆檔案館所藏民國檔案、臺北「國史館」所藏民國檔案、俄羅斯所藏國家經濟檔案等，以1930年代和1940年代為核心，以礦產資源開發為主線，闡釋19世紀末以來在新疆資源開發基礎之上形成、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層」，為近代中國邊疆歷史的現代性提供新的認識。

然而，由於作者引用地緣政治分析的視角，結合檔案史料的記載，主要側重於展示新疆的省級官員、地方精英、各帝國權益的代理人、中國中央政府官員和國際市場的代表相互博弈的細節，但卻缺失對新疆本土人群的關照。自乾隆時期以來，新疆天山北麓地區形成連片的農業區和比較穩定的移民社會，而塔城、阿爾泰山一帶則分佈着蒙古、哈薩克等遊牧人群，洞察並思考這些本土人群在近代新疆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的「能動性」，以及他們與各方勢力之間的互動，可能有着更多的闡釋與討論的空間。此外，對區域環境史的深刻理解，還是需要關照區域各個要素，金家德在本書中對近現代以來新疆的大規模的水土開發活動的關注不夠，因此其文中最後闡釋的新疆經濟地理格局有進一步修正的餘地。

郭欣悅、張莉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羅兆均，《人神之間：湘黔桂界鄰地區飛山公信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338頁。**

《人神之間：湘黔桂界鄰地區飛山公信仰研究》一書是羅兆均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之上修改完成的一部力作。除導論和結語外，全書一共分為六章，分別是：一、族群、祠廟與邊疆治理；二、邊疆治理下的飛山公信仰「標準化」與「正統化」；三、靖州飛山廟：歷史記憶與「總廟」話語；四、人群與神明：村落結構下的家族互動與信仰建構；五、替代與變身：誰是飛山公？六、多元身份變奏：楊再思是誰？全書章節架構的編排緊緊圍繞着飛山公信仰的不同側面逐一展開，邏輯嚴密，層層遞進。

作為「清水江研究叢書」之一，該書以整體的區域的視角，從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為我們展示飛山公楊再思如何從唐末宋初以來，經歷不同朝

代，從楊氏的祖先演變為地方神靈，最後成為超越地域性、族群性的區域性神明。以飛山公信仰的演變歷程為切入點，進而認識湘黔桂區域社會。作者在結語裡再次重申：本書以區域研究為視角，通過對湘黔桂界鄰區域飛山公信仰於不同空間場域中、不同人群歷史記憶下多樣性實踐的歷史人類學考察，透過在國家與地域社會互動中飛山公信仰「標準化」、「正統化」過程及其特徵的展現，揭示湘黔桂界鄰地域社會民眾的生活實踐與區域社會結構、地域支配關係的關聯與過程演變。（頁291）

飛山公楊再思信仰集中存在於湘黔桂界鄰地區以侗、苗等為主體族群的村落社會中，最早可追溯至唐末宋初的楊再思以「刺史」的身份，經歷不同朝代，在神明「標準化」、「正統化」的作用下，楊再思不斷被敕封和建構，逐漸走上歷史傳說的敘述舞臺，被刻畫成「忠於朝廷」、「助朝平叛」、「保境安民」、「有求必應」的符合國家和地方民眾共同需要的神靈。飛山公信仰肇跡於湖南靖州飛山一帶，以飛山祠廟為顯著性標誌。在飛山公信仰實踐背後，作者始終關注三個重要群體：以飛山公楊再思後裔自詡的楊氏、信奉飛山公的普通民眾以及作為地方社會管理者的政府。作者借助鮮活生動的材料和案例，為我們分別展示三個不同身份的群體如何從各自的立場和角色出發，不斷演繹、建構、闡釋飛山公信仰文化。

作者首先討論以楊氏群體如何建構和想像楊再思「英雄祖先」的形象。「在楊氏看來，楊再思是以『英雄祖先』的身份存在的，某種程度上其祖先的身份超越神明角色，而神明角色同樣被側重講述，因其為祖先角色增添了最榮耀的光環。」（頁14）因此，作者認為探討地方社會中楊氏宗族集體行動下的如何進行飛山公楊再思「英雄祖先」的建構具有一定的意義。事實上，作者給我們提供生動的案例，湘黔桂界鄰區域的楊氏在不同時代的數次編修家譜中都將楊再思追溯為一世祖，根據氏族融入法創造可嵌入的氏族譜系結構。楊氏在建構楊再思「英雄祖先」形象時，不僅與中央王朝邊疆開發下「平蠻」歷史相結合，同時將楊再思與歷史上楊氏名人楊通寶、楊業、楊震等聯繫起來，並以楊氏宗族的身份向地方政府提出成立「『飛山蠻』民族文化研究會」的訴求，儘管未獲批准，但並未放棄。該書第四章第三節「英雄祖先」建構下的家神信仰、第六章第一節地方策略下的楊氏「英雄祖先」建構均是在討論這一話題。

緊接着作者從第二層面展開討論普通民眾關於飛山公的信仰和儀式實踐，也就是在這一維度上，進一步展示飛山公楊再思如何從楊氏的英雄祖先成為苗、侗、土家、漢等多族群信仰的跨越區域性、族群性的神靈。「對於

廣大的普通民眾來說，飛山公已經脫去『楊氏祖先的外衣』變成一位有求必應的神明，其靈驗主要體現於民眾講述的不同類型的靈驗故事以及不同空間場域下民眾對飛山公進行的各種祭祀活動中。」（頁14）其中的一個物化標誌之一就是大量以飛山廟、飛山宮、飛山祠、威遠侯、楊公廟等命名的廟宇出現在不同的村落社會中，不僅如此，民眾借助飛山公帶兵打仗、保護地方百姓的歷史想像，建構出不同的飛山公祭祀儀式，如靖州飛山廟祭祀飛山公時燒草鞋、馬糧等；而湖南沙溪鄉的民眾則在農曆六月初六飛山公的誕辰或十月二十六日飛山公的忌日舉辦廟會。顯然，在地方民眾的心目中，飛山公不僅能保佑村寨興旺、五穀豐登，而且能護佑身體健康、外出發財，儼然是一位多功能的神靈。更有意思的是，明清以後，隨着清水江流域木材貿易的興起，沿岸村寨出現大量楊公廟以祈求水運放排平安，人們將水神楊公與楊再思相混淆，出現飛山廟共同祭祀水神楊公與楊再思的現象。民國以後，伴隨着木材貿易的衰落，水神楊公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當下，民眾更是有選擇性的側重於傳統民族節日的建構與展演，以便獲得更多的發展主動權，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民眾神靈信仰的功利性和現實性。

最後，作者從另一個側面討論作為地方管理者的政府如何看待和理解飛山公的信仰文化。其實，從該書第一、二章的鋪陳中，不難看出，飛山公之所以成為區域性的神明，是地方社會與中央王朝不斷互動的結果。事實上，地方政府在旅遊文化發展帶動經濟增長的當下，也成為楊再思歷史傳說的講述者，只不過「對同一神明的敘事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轉變，其基於地域社會特徵，將飛山公楊再思視為推動當下經濟發展的重要歷史文化資源，嘗試着採借楊再思背後的歷史、族群等因素為地方發展服務」。（頁14）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政府主導下民族文化資源的挖掘，將楊再思視為歷史名人，大力打造飛山文化節。

行文至此，不難發現，作者從自詡楊再思後人的楊氏宗族、普通民眾、地方政府三個不同群體出發，層層遞進、步步鋪陳，運用生動詳實的民族學田野調查資料和個案，展現不同社會生境下、不同身份的人群如何看待、理解、運用飛山公信仰文化。需要明白的是，作者關注的不僅僅是信仰實踐本身，更是透過飛山公信仰來理解區域社會的村落結構、移民歷史以及人群關係，這樣的多個維度疊加，給讀者勾勒出湘黔桂界鄰區域社會多族群、多元文化體系的整體社會面貌。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凸顯出清水江流域個案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讓讀者深切體會到「這些研究實踐所帶出的關於清水江流域的總體認識，同時提供了看待整個清水江流域如何進入中華文明系

統的獨特視角」。(頁4)從開篇到結束，作者始終貫穿着歷史人類學的視角，以一種整體的、區域社會空間的開闊視野來進行討論，並不時與學界相關理論進行對話，而非沉浸在細碎的田野資料中自說自話，也沒有落入宏大歷史敘述下區域研究的空洞，我想這是做民族學和歷史學研究的同輩需要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此外，該書的一大亮點就是資料的收集和運用。眾所周知，區域史的研究離不開豐富的史料鋪陳，然而，飛山公楊再思作為區域性的神明信仰，並無正史記載，且地方官方文本的記載也極為有限，其靈應的傳說諸如飛山公顯靈抵抗土匪、護佑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等僅存在於民眾的口述記憶裡，燒草鞋、巡遊等祭祀儀式主要是民眾基於地方生境下的想像和建構。在此情形下，作者充份發揮人類學田野調查獲取資料的優勢，通過對沙溪、東山、高友、江口等地的多點田野考察，大概統計出湘黔桂界鄰區域飛山廟的分佈情況(見附錄一)，包括所在地、名稱、建立時間、祭祀時間以及遺存情況，細緻而周全，實在難能可貴。基於上述統計資料，作者對飛山廟的管理者及信徒進行深入訪談，獲得大量珍貴的口述資料，有助於「『從文本以外更民間』的視角深入理解地域社會時空下民眾生活和信仰實踐」。(頁15)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充份運用歷代碑刻、族譜文類、地方志書、民間口承傳說、祭祀等科儀文、政府相關檔案，「從文獻中探知田野背後的骨架、以田野彌補骨架下欠缺的血肉」。誠如該套叢書主編張應強在總序中言明的「每項具體研究都自成一體，都有其自身的整體性，且這種整體性是由各自的問題意識以及相關材料收集和運用所決定的」(頁3)。不可否認的是，該書提供了如何通過宗教信仰研究區域社會的鮮活個案。

王勤美

貴州大學歷史與民族文化學院

**劉婷玉，《鳳凰于飛：家族文書與畚族歷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389頁。**

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學者就開始畚族調查與畚族研究。至50年代民族識別與民族歷史大調查工作，畚族研究的一些基本命題漸漸得到梳理。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畚族研究趨於多元，研究者們對畚族語言、畚族音樂、